

周征松 著



魏晋隋唐间的
河东裴氏

山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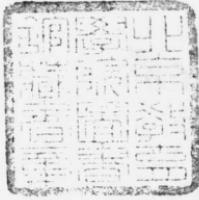
周征松 著

K820.9/6

限三



魏晋隋唐间的
河东裴氏



0000118798

山西教育出版社

418399

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

周征松 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字数：206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5440-1748-6

K·1 定价：12.00 元

内 容 提 要

门阀士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本书试图对其中的河东裴氏进行个案研究，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它的滥觞、崛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以及河东裴氏盛衰的原因和它的独特贡献；以河东裴氏的历史发展为经，以其杰出的历史人物为纬，编织了一幅内容丰富翔实、人物重点突出的河东裴氏发展史。

本书致力于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来看河东裴氏的历史，又以河东裴氏的历史来反映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充分搜集和利用传统的历史文献，尤其是第一次利用了传世的家谱文献和大量的碑刻墓志史料，考证详明、叙述简要、文字生动，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河东裴氏家族史专著。

本书在河东裴氏的得姓之由、河东裴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河东裴氏诸人物的评价方面，都具有独到的见解。

本书适合于家族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

序

瞿林东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地主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存在。门阀地主的出现，同当时的土地兼并、人口逃亡、户籍减少有极大的关系，也同两汉以来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与家族历史的延续、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以其同两汉时期的世家地主作一比较的话，它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门阀地主跟世家地主一样，也是有政治身份、世袭特权的地主。但门阀地主是依靠家族的传统地位形成，这跟世家地主的形成是由于皇家所规定的政治身份是不同的。在土地权上，门阀比世家有更多的家族私有性质。在劳动力上，门阀掌握的，主要是荫附农民。荫附农民是脱离了国家户籍的农民，他们交纳的地租不再具有国家赋税的性质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户籍农民要低些，但对于国家赋税，其中包括繁重的劳役，是可以摆脱的。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相对变化，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第18页）可以这样认为，门阀地主是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它曾经是那个历史阶段约六七百年中的生产关系的支配者，并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而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家族的传统地位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

关于这一历史现象，魏晋以下、唐宋以上的历史撰述皆有明显的反映，而从历史上或理论上有所阐发者，如唐人柳芳、宋人欧阳修、郑樵等，多有卓论，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还写出了《六朝重氏族》、《谱学》等名篇，这都为后人从史上和理论

上观察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资料。这一现象在历史撰述上的主要表现是：

其一，是家传的兴盛。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来看，其著录家传多种，而早于它们的《世说新语》注所根据的家传数量又远远超出它们的著录，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家传的兴盛。南朝史家沈约撰《宋书》，北朝史家魏收撰《魏书》，唐初史家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多有一个传主之下附记其兄弟、子孙数十人者，正是这种家传兴盛之风影响到正史撰述的表现。

其二，是谱学的发达。在家谱、家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谱系之学，在东晋、南朝蔚为时尚，先后有贾氏谱学、王氏谱学名于世。《隋书·经籍志》史部专有“谱系篇”，指出士人“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之别，而“氏姓之书”则为世所重。这是历史文献学上明确了谱系之书的地位。

其三，是世表的创立。司马迁《史记》有《三代世表》，是讲的王朝的历史，欧阳修《新唐书》有《宰相世系表》，是讲的家族的历史，主要是门阀家族的历史。此外，唐人柳芳论谱学源流（《新唐书·儒学传中》），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序论谱系之书的作用和谱系之学的兴衰，都是史家关于这方面的真知灼见。

郑樵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序）谱系之学因与选举、婚姻有直接的关系，故为官府、私家所重视，而其最本质的作用是

维护“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门阀社会的秩序。从历史的发展和谱学的演变来看，这个社会秩序正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特点。80年代初，我曾撰写《唐代谱学简论》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阐述上述情况在唐代社会生活中上自皇室、下至私门的种种表现。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谱学也衰落了，这个变化是在中晚唐逐渐发生的。郑樵所谓“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非常中肯地说明了史学发展的特点本取决于历史发展的特点。

柳芳在论谱学源流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儒学传中》）柳芳提到的都是“著姓”大族。其中，裴姓就是本书所论述的河东裴氏。欧阳修撰《新唐书》，创《宰相世系表》，其序云：“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陨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所谓“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正是门阀地主时代的社会风气。其表以裴氏居于首位，并在后论中说明：“裴氏定著五房：一曰西眷裴，二曰洗马裴，三曰南来吴裴，四曰中眷裴，五曰东眷裴。宰相十七人。”这就是说，在唐朝历史上，平均十七年左右，裴氏就要出一名宰相，可谓显赫之至。若能揭示家族在门阀时代的历史，不仅对于人们深入认识门阀地主的演变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人们深入认识门阀时代的历史特点是有意义的。周征松教授所著《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一书，正是为此而撰写的。

征松教授撰写此书，带有拓荒的性质，因而需要有学术上的勇气。论门阀，辨士庶，史学界由来已久，并曾引起过热烈的讨

论。但具体地剖析某一门阀、某一士族的历史及其与朝代历史、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著作，则尚不多见。这是一件烦难的工作，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征松教授的执着和勇气，令人钦佩。

作者撰写此书，颇下了一番功夫。他对于有关河东裴氏的文献的搜求，对于裴氏家谱的寻访，对于裴氏墓志的研究，均用力甚勤，从而使三者相互补充、印证，极大地丰富了有关正史对裴氏历史的记述。可以认为，本书中有关家谱、墓志材料的运用及其学术价值，是最值得人们关注的成果之一。

在撰述方法上，本书以朝代历史脉络为经，以裴氏有代表性的人物为纬，前者虚写，后者实写，两相配合，首尾连贯，于家族史的演变中仍可透视朝代史的进程。对裴氏人物的表述，作者都尽可能地结合有关重大事件给予恰当的评价，从而避免了家谱式的叙述，增强了所论人物的历史感。

本书最后一章提出裴氏盛衰的原因和裴氏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上的成就，是两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关于门阀的盛衰，欧阳修有一个说法：“然其所以盛衰者，虽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这是从家族史本身的角度来看其盛衰。其实，不论是“功德薄厚”，还是子孙贤否，都首先取决于历史时代的变化。唐初以来，由于统治阶层权力的再分配的原因，传统的门阀观念逐渐受到动摇。唐太宗时修《氏族志》，便已开始崇重开国权贵的社会地位；至唐高宗、武则天时修《姓氏录》，以军功至五品以上者尽可进入士流，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门阀观念，士、庶合流的趋势更加显著。加之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取士范围的扩大，非门阀出身的士人以此进入仕途者日渐增多。在经济上，隋唐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劳动人手的管理，对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整顿，削弱了门阀地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于是在唐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门阀地主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阶层便从历史上

消失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还有必要作深入、全面的探讨。

关于河东裴氏在文化上的成就，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裴秀（224—271）的地图学在中外地图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裴𬱟（267—300）著有唯物思想倾向的名篇《崇有论》，裴松之（372—451）、裴骃、裴子野（469—530）、裴矩（？—627）、裴垍、裴庭裕等皆长于史学，其中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骃的《史记集解》、裴子野的《宋略》（已佚），尤为知名。门阀士族在家学上的这种传承和贡献，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上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比如仅以史学而论，刘氏、杜氏、韦氏家族都产生了大史学家。可见，这种现象在文化史和史学史上都是值得作深入研究的。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在中国古代，家学的传承同官学的授受，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各起了怎样的作用？它们是否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如果有的话，这种互补关系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既是研究门阀士族历史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探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问题，相信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征松教授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年，论著多有创见。他点校的唐人马总《通历》一书，对治唐代史学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这本新著，是他从史学史研究拓展开去，走向家族史研究的一个尝试，一个新的界标。《大和通选》的编者裴潾亦出于河东裴氏，他有这样的诗句：“动复有原，进退有期。用在得正，明以知微。”（《全唐诗》卷五〇七）我借用这四句诗来比喻治学，以表示对作者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与开拓精神的钦佩。

是为序。

1998年1月12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目 录

MUEC

序	瞿林东	(1)
第一章 河东裴氏的滥觞和崛起		(1)
第一节 河东裴氏的祖居地——闻喜县		(1)
一 地理环境		(1)
二 历史遗迹		(4)
第二节 河东裴氏的滥觞——春秋时期		(13)
一 与秦同祖		(13)
二 赢鍼开氏		(18)
第三节 河东裴氏的崛起——两汉时期		(23)
一 侍中裴盖		(23)
二 敦煌太守		(25)
三 汉末裴茂		(28)
第二章 河东裴氏的发展——魏晋时期		(30)
第一节 裴氏三祖		(30)
第二节 八裴八王		(35)
第三节 裴秀裴頠		(39)
第四节 《裴启语林》		(46)
第五节 裴氏播迁		(50)
第三章 河东裴氏的继续发展——南北朝时期		(57)
第一节 将门有将		(57)
第二节 史学三裴		(64)
第三节 “三河领袖”		(78)
第四节 墓志奇观		(90)

第四章 河东裴氏的鼎盛（一）——隋朝时期	(97)
第一节 平陈之役	(97)
第二节 参定律令	(100)
第三节 实行貌阅	(103)
第四节 沟通西域	(110)
第五节 出使倭国	(117)
第六节 捕杀炀帝	(122)
第五章 河东裴氏的鼎盛（二）——唐朝前期	(129)
第一节 鼎助起兵	(129)
第二节 为唐献身	(137)
第三节 儒将之雄	(143)
第四节 御书褒美	(151)
第五节 鼎新漕运	(155)
第六节 四大尚书	(162)
第六章 河东裴氏的鼎盛（三）——唐朝后期	(172)
第一节 力赞中兴	(172)
第二节 慧眼识人	(185)
第三节 中兴名相	(192)
第四节 中兴名相（续前）	(205)
第五节 漕运新法	(213)
第七章 河东裴氏的衰落——唐朝末期	(221)
第八章 河东裴氏盛衰的原因及其文化贡献	(230)
第一节 盛衰原因	(230)
第二节 文化贡献	(238)
附录：河东裴氏明清进士表	(253)
后记	(257)

第一章 河东裴氏的滥觞和崛起

第一节 河东裴氏的祖居地——闻喜县

一 地理环境

河东裴氏的祖居地，在今山西省闻喜县。闻喜县，汉代属河东郡，所以称河东裴氏。

河东，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地理上说，黄河走出内蒙古河套地区，进入秦晋高原大峡谷，成南北直线走势，很自然地成为秦晋的分界线。在黄河的这一段，大河之西为陕西，大河之东为河东，即今山西。所以整个山西都是河东。从历史上说，河东作为行政区划的单位名称，变化是很大的。秦朝设河东郡，下辖 24 县，大致相当于今临汾、运城两地区，直至唐朝。新莽改安邑县为河东县，汉、晋因之，故治在今夏县禹王乡。隋至元，一直有河东县，大致相当于今永济县，明初省入蒲州。唐置河东道，下辖河中府、太原府，故治在今太原市南郊区古城营村。宋置河东路，下辖太原、隆德（潞州）、平阳三府，故治在今太原市。明置河东道，辖平阳府，故治在今临汾市。清置河东道，下辖平阳、蒲州二府，故治在今运城市。民国因之，1930 年废。所以，河东，既可指山西大部分地区，又可指今临汾、运城两地区，还可指今运城地区。河东裴氏的祖居地是闻喜县，后来逐渐扩散到夏县、安邑、稷山、新绛、曲沃、襄汾等地。所以河东地区，也可以理解为山西西南地区，大致相

当于今临汾、运城两地区。

山西西南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河东裴氏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以汾河流域和涑水河流域所形成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历史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土地肥沃，适宜于农、林、牧的发展。所以这个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东裴氏在这个地区发展壮大，这不是偶然的。

闻喜县地处临汾、运城两地区之间，行政上归属运城地区。处于北纬 35 度 9 分 38 秒至 35 度 34 分 11 秒，东经 100 度 59 分 32 秒至 110 度 37 分 29 秒之间。东接垣曲，西接万荣，北邻新绛、侯马、绛县，南邻夏县、运城。闻喜县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它处于运城盆地的北端，紧邻临汾地区。东部绵亘着中条山，层峦叠翠；西部耸立着稷王山，孤峰独标。稷王山下是由万条梯田构成的峨嵋岭，蜿蜒起伏，沟壑纵横。西北部的北塬，旷阔而苍凉。中部涑水河谷地，平坦而富饶，纵贯全省的道路交通穿越其中。交通便利，往南可达豫、楚、秦、蜀，往北可达太原、大同、京、津、冀、蒙、东北。物产丰富，富产粮棉、蔬果、芦苇、药材、铜矿、大理石矿等。六畜兴旺，尤以三白驴闻名全国。闻喜，这是一块适于人类居住的宝地。河东裴氏就植根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

河东闻喜，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以“代有闻人”著称。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说：“闻喜，士大夫之林薮也。”裴氏之外，在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还有毋丘俭、郭璞、赵鼎、杨深秀等。

毋丘俭（？—255），字仲恭，闻喜邱村人。他的父亲毋丘兴在魏文帝时为武威太守，因功封高阳乡侯。毋丘俭在魏明帝时为洛阳典农；曾为朝廷迫使农民营建宫室事，上书劝谏，升为荊州刺史。景初二年（238 年），率部协同太尉司马懿平定辽东；被封为安邑侯。魏齐王正始五年（244 年），俭率军讨高句丽，

攻陷其都城丸都，安定了东部边境，刻石记功而还。俭为镇南将军，固守合肥。嘉平五年（253年），嘉平六年，魏中书令李丰和皇后之父张揖等密谋夺取司马师的权力，事情败露，司马师将李丰等人诛灭三族，绞杀张皇后，废掉皇帝曹芳，迎立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年）毌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公布其罪状11条。兵败，与其子秀和孙重俱被杀，夷灭三族。毌丘俭是曹魏时期的军事家，在司马氏势力日益膨胀的形势下，他搭上性命也无力挽救曹魏的颓势。

郭璞（276—324），字景纯，闻喜县西官庄乡人。他学问广博，敏而好学。他的《尔雅注》，简括确切，实事求是，后儒注《尔雅》，不能出其藩篱。以这种精神，他还注释了《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水经》、《楚辞》、《子虚上林赋》等。永嘉之乱后，他来到南方。晋元帝以他为著作郎、尚书郎。大将军王敦起兵反晋，请郭璞作记室参军。他起而反对，因而被杀，年仅49岁。郭璞又是诗人，他的《游仙诗》，被认为与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齐名。南北朝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和钟嵘都推他的诗作为东晋第一。

赵鼎（1085—1147），字元镇，闻喜县礼元镇阜底村人，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历仕洛阳令、司勋员外郎、右司谏、御史中丞、江东和江西安抚大使、知枢密院事、都督陕川荆襄军事等官职，两度入相，被誉为“南宋贤相，首称赵鼎”。北宋末年，面对金兵咄咄逼人的攻势，赵鼎力主抵抗，反对屈辱求和，在大仪镇大败金兵。南宋初年，他任右司谏时，曾提出过40项建议，多数被采纳，使南宋一度出现了中兴局面。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但他未能识破秦桧的真面目，秦桧得势时，他被排挤、迫害，最后被迫绝食而死。有《忠正德文集》传世。

杨深秀（1849—1898），字漪春，又字漪村，闻喜县仪张村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之一。同治九年（1870

年)举人。光绪八年(1882年)，应聘助修《山西通志》。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补刑部郎中。二十三年(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一起积极主张革旧图新，坚决反对租让胶州湾给德国。次年二月，俄国强占我旅顺、大连，他上疏请联合英、日抗俄。由于光绪皇帝变法的态度“游移不断”，杨于四月十三日上疏，强调“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维新进入实施阶段。变法派遭到顽固派西太后的残酷镇压。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囚于瀛台，把前来抗诘的杨深秀等打入监狱。他在狱中坚强不屈，“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十三日，杨深秀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年仅49岁。后人将他和其他被害的维新派人士五人，称为“戊戌六君子”，以表示对他们爱国图强精神的崇敬。

正是在闻喜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人文荟萃的宝地，产生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文人学子，河东裴氏在其间萌芽、发展、壮大，直至走向辉煌。

二 历史遗迹

河东裴氏的祖居地在闻喜县。自春秋以来，河东裴氏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了2500多年。他们在这个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留下了丰富的生活遗迹。但是，由于岁月风雨的涤荡，今天我们在闻喜县境内所能看到的，已经只是吉光片羽了。我们现在只能凭借这些幸存下来的历史遗迹，来追寻他们往日的辉煌。

根据历史的遗存和目前裴氏在闻喜的分布，我们大致可以确定，河东闻喜裴氏的活动中心地区在闻喜县东北的礼元、裴村、横水和郝庄之间(横水、郝庄今属绛县)。在裴氏活动的这个中

心地区，裴氏遗留下的活动遗迹主要在裴晋公祠所在的裴柏村和紧邻这个中心地区的裴氏家族墓地。

裴柏村在礼元镇附近，地处闻喜县城东北，距县城 25 公里。这里自然环境优美，北面、西面和南面为峨嵋岭的大小山岭所环列，东面是现代南北走向的铁路、公路，古代的官道畅通无阻，再往东是从绛县发源的涑水河汩汩流过，水肥土美，是从事传统农耕的好地方。裴柏村是裴氏的祖居地（全村现有裴氏后代 200 多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1/4），历代在这里竖立和收藏的碑刻很多。但是究竟有多少，莫知其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村东二级公路东侧麦地里“唐晋公裴度故里”碑。说明裴柏确实是唐代表裴度的故里。此碑东面约 10 米的地方竖立着“宋丰公赵鼎故里”碑。两碑相向而立，形制和字体完全一致，同为闻喜“邑令河朔古陟州李如兰立”。两碑之间，正是古代官道通过的地方。裴柏村在官道旁边，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的方便，更有利于裴氏通过这条宽阔的官道，走南闯北，走向全国的社会大舞台。裴度和赵鼎这两位唐宋的名相，是这一方热土造就出的历史名人，两块故里碑常年累月默然地站立在旷野上，无言地激励着他们的子孙后代，积极地投身于新生活的建设。

裴柏村北的裴氏宗祠（又称裴晋公祠）遗址，则是裴氏碑刻的宝库。宗祠创建于贞观三年（629 年），迭遭兵火，历代重修，现在殿宇房舍已荡然无存，只有一对石头大狮子，神气活现，使人依稀想见裴氏当年的神韵。1986 年，省、地、县文物管理部门出资在裴晋公祠遗址上圈筑了围墙，修建了门楼，新添了一座碑馆，将原来散落在宗祠遗址上的数十通碑刻全部有秩序地竖立在碑馆里，保护了这批历史和艺术的珍宝。碑馆里的碑刻，较为重要的有：北周裴鸿碑、唐裴镜民碑、唐玄宗御书裴光庭碑、平淮西碑、金刻裴氏家谱碑，清刻裴氏家谱碑，还有几通明清时期的宗祠重修记碑。1993 年又从村口出土了《裴氏兄弟积德流芳

序碑》，放置在院内。

《周故开府高邑侯裴史君（鸿）之碑》：据《河东裴氏新谱》（闻喜裴氏研究会收藏），此碑与裴镜民碑俱为裴纬度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春在裴氏家族墓地永青掘出，移置裴柏村裴晋公祠内。裴鸿，卒于北周天和三年（568年），《周书》有传，碑文较传文详细，可补史传之不足。碑文为隶书，字体圆润工整，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欣赏价值。裴鸿碑，这是裴氏碑馆现存年代最早的碑刻。

《隋故益州总管府司马裴君（镜民）碑铭并序》：是裴氏碑馆中的瑰宝。裴镜民（？—596），父景汉，仕北周，官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赠晋州刺史。镜民仕北周，为大将军，谭公字文会记室参军。入隋，为兵部侍郎，备称“明干”。又为西南道行台兵部侍郎，兼益州总管府司马。开皇十六年（596年），西南夷构乱，他总率士卒讨伐。由于援兵不至，陷于危局，于三月十九日被俘遇害。此碑立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十月二十一日。撰写《北齐书》的唐代史学家李百药撰文，书法家殷令名书丹。宋赵明诚《金石录》称，令名与其子仲容皆以书法擅名一时，笔法精妙，不减欧（阳询）虞（世南）。碑中字体，遒劲多姿，名不虚传，为唐初书法精品。

裴光庭碑，原置于闻喜县东门外，仅残留半截。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经裴纬度移至裴柏村裴晋公祠内，使它不至于再遭毁坏。裴光庭（675—733），字连城，裴行俭之子。他是弘文馆学士，玄宗朝的宰相。卒，谥忠献，赠太师。唐玄宗命中书令、集贤院学士张九龄为其神道碑撰文。神道碑文，御书，裴耀卿题御书字。宰相李林甫题额。谏议大夫褚廷诲摹勒。此碑君臣共建，名人荟萃，可谓一时盛事，千古留芳。

金刻裴氏家谱碑。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所刻《裴氏家谱碑》，是河东裴氏保存至今的极为重要的石刻谱牒。碑额题为